

国际经济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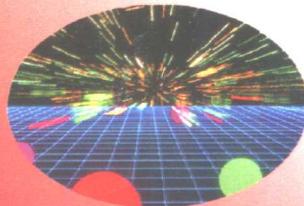
YITIHUA JINCHENGZHONG DE
ZHENGFU YU QIYE

山西经济出版社

一体化进程中的 政府与企业

——市场开辟与市场替代的统一

高乐咏 著



国际经济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一体化进程中的 政府与企业

高乐咏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书 名：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

作 者：高乐咏

出 版 者：山西经济出版社(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编:030012·电话:4922059)

发 行 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铁三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125

字 数：198 千字

印 数：0001—2000 册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36—331—9/F·327

定 价：14.80 元

责任编辑:张凤山 复 审:侯新院 终 审:张凤山

助理责编:李 新

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仅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也引起了社

序 言

时代的步伐正在迈向 21 世纪。21 世纪的世界将如何发展? 她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现在人类面前?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研究国际经济前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但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只有短短 200 年历史。18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开创了以轻工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时代;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科技革命开创了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时代。不论是轻工业化还是重化工业化,都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改变了经济面貌和社会生活。但是机遇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是不均等的,只有具备了各种条件(当然也包括主观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才赢得了机遇,走在了前头。

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信息革命的时代,她会使整个产业高新技术化。一方面,新兴尖端产业会不断运用而生;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又会被高新技术全面改造。产业和经济的发展还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迁。在信息革命的基础上将会使未来社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仅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学家、未来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的极大关注。日本国际大学

公文俊平教授提出“智业”、“智民”将主导 21 世纪。所谓“智业”是指与国家、政府和企业不同的组织，它用普及知识和信息的形式给社会以智慧的影响力。“智民”就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主要活动场所从事“智业”活动的新型市民，或称网络市民。“智业”的出现并不代替企业，而是与企业结合为一种协力关系（参见日本《jitsugyo no nihou》杂志 1996 年 4 月号）。不管公文俊平所描绘的未来社会有多大程度的正确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计算机信息网络是 21 世纪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枢神经系统，教育则是这一系统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础。难怪 80 年代初就有某些发达国家的学者把产业结构从三类产业细分为五类，把信息产业和教育产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产业来认识。随着高新技术产业时代帷幕的拉开，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第 1.5 产业和第 2.5 产业等边缘、交叉产业的新概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各地区在产业结构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分析其原因，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固定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然而不能不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特别是在上述不同的主导产业交替的时代，首先采用最新科技成果的国家将率先更新产业结构，如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英国和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美国就是这样。应该看到，科学技术越发展，世界上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差别就越明显，差距也越大。目前美国已经历了一段面向高新技术产业时代的结构调整，从 90 年代开始日本以及欧洲某些国家也随后走上了这一历程。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还在重复先进国家已经做过的事情。可以预见，在 21 世纪世界上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之间的差距将日益扩。当然，这并不排除个别国家和地区的例外现象。

人们经常讲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_S)就是迅速跻身于发达经济行列的有力说明。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性转变之一是东亚的崛起。世界银行为此发表了“东亚奇迹”的专题研究报告。确实,东亚成了20世纪末世界的增长中心。但是对于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内涵和东亚能否持续增长下去,人们有着不同的估价。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有名的论文《虚幻的东亚奇迹》便是持怀疑态度的代表。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学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克鲁格曼理论的佐证,因为引起这次危机的原因与克鲁格曼所说的是不同的。笔者认为,东亚能否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是看东亚是否已经形成了区域内自身的增长机制以及这一机制的源头能否保持足够的能量。笔者曾提出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其动力主要是投资推动和市场拉动。因此,在信息革命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中,只要能在这一地区不断保持足够的资本投入和不断扩大市场容量,便会持续增长下去。当然,人们已经看到,由于东南亚危机东亚高速增长已经出现了较大的波折,从而使其中断。笔者认为这一中断是暂时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会恢复其活力。当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目前的调整并不意味着高速增长的结束,而只是一个插曲。我们还应看到,即使东亚再次恢复活力,随着产业成熟化也会影响其增长的势头。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即使东亚增长速度下降,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也还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至少是最快或较快的地区之一。

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长周期)的讨论。相信这一理论的多数学者认为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次新的上升期。以往的长波理论多数只注意经验实证和原因分析,很少和地区选择结合起来。我们要问,新的上升期,如果准确的话是21世纪的前20年,它的地区选择在哪里?如果前述关于东亚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是否可以说东亚地区可能成为新的长波上升期的中心之一。联系到上述关于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论述,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国、东亚和欧洲的部分国家是新的长波上升期的中心地带。

长波上升期能否到来关键要看它是否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基础。从7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的逐渐普及、电子高速公路的开通和国际联网的实施、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的进展、生物工程研究的深化等等都在技术创新领域积累了能量,奠定了长波上升期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在国际化、区域经济集团化、一体化和全球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在制度创新方面构筑了推进长波上升期的经济结构基础。不管承认长波还是否认长波的经济学家,对以下所述的经济制度创新应该说都是认可的。

20世纪末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欧共体已发展为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已经开始运转。欧洲联盟不仅在资本、商品、劳务等方面做到了自由流动,而且在统一货币方面也迈出了步伐,进而将从经济一体化逐步走向政治一体化。90年代以来,更引人注目的当属亚太经合组织(即APEC)了。1994年茂物会议提出了APEC投资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并规定了发达国家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于2020年完成的时间表。在1995年的APEC大阪会议上通过

了《行动议程》，1996 年在苏比克会议上进而通过了《马尼拉行动计划》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APEC 把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两个重要支柱，把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APEC 的经济合作方式突破了原有的理论框架，创建了一种新的模式。区域经济集团化、一体化的进展，从长期来看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它推进着经济国际化的进程。

在经济国际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发展。1980 年世界跨国公司共有 1.5 万家，到 1995 年已发展到 4 万家。它们掌握着全球生产的 40% 左右，国际贸易的 50% ~ 60%，国际技术贸易的 60% ~ 70%，科学研究与开发的 80% ~ 90%，国际投资额的 90%。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运行主体，形成了全球的经济网络（参见李琮《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

战后关贸总协定曾在推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 70 年代以后逐步遇到了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挑战。经过乌拉圭回合的多年谈判于 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正式启动，从而使世界多边贸易体系有了重大发展，无疑这有利于抑制贸易保护主义。不论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已经说明了贸易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因此，WTO 的建立有助于世界贸易发展，也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在国际经济领域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际货币体制。从历史上看，凡是国际货币制度稳定的时候，便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相反，凡是国际货币制度动荡的时候，则不利于世界经济增长。战后，布林顿森林体系形成的固定汇率制是促成 50 年代 ~ 60 年代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70 年代初布

林顿森林体系瓦解并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各国货币比价不断大起大落地进行调整,成了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经过20多年的变化,目前虽然国际货币体制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稳定的组织形式,但今后如果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在一段时间内大体保持稳定,而各国政府又能够协同维持汇率基本平稳的话,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来说至少不是一个负相关因素,还有可能成为推进因素。现在看来,这一点正在逐步实现,特别是随着欧洲单一货币制度的到来,将更加明显。

鉴于对以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分析,可以认为一次新的长波上升期即将来临,甚至可能已经来临。

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如何更好地认识并利用机遇、迎接挑战是一个重要课题。愿我们的《国际经济前沿问题研究丛书》能够适应这一需要。因此,我们希望丛书或者能够回答国际经济前沿问题的热点、焦点、难点;或者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在丛书问世之际,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关心丛书、帮助丛书出版的专家、学者。我们对山西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高瞻远瞩推出丛书规划表示十分赞赏和衷心感谢。我们对读者表示真诚的欢迎和谢意,我们更希望读者能溶入到我们的丛书计划中来,对我们提出批评、建议,与我们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提高,使丛书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园地。

最后,我们郑重宣布,进入丛书是有严格条件的,每本书的内容,其论点与论据以及所用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作者的独立看法,我们希望读者尊重他们的著作权,同时各书的作者也对其著作负全部责任,即所谓文责自负。

如果丛书能够为推进中国国际经济问题研究事业的繁荣,

为中国赢得发展机遇做出一点工作,丛书出版便达到了预期目的。

薛敬孝

1998年9月18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前　　言

世界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一体化的历史。几乎在任何场合我们都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时代。尽管一体化一词所概括的经济现象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但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现代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或者说是公司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的统一。因此研究这两种一体化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对认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意义重大。

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公司一体化都是战后世界经济中十分重要的现象。自从50年代末以来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较长的时间里，对这两种一体化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地进行的。邓宁(J·H·Dunning)1987年撰文称，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尝试将这两种一体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地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资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够的。^①这种状况也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

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开始起步的阶段，国际贸易作为联系各

^① J. H. Dunning and Peter Robs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XXIV No. 2 December 1987.

国经济的主要渠道，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际分工主要依据国家特有优势(*country specific advantage*)来进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在其最初阶段也往往采取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它的基本目标首先是在一定范围内解决贸易自由化问题。这使有关地区一体化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联系。在分析方法上，较早的一体化理论比较注重实证性的具体问题，而缺乏对有关的制度因素(*institutional factors*)及其行为方式的分析。比如，虽然地区一体化理论中也包含了对资本和中间产品的流动的分析，但是这种流动是如何组织的，以及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的，则较少涉及，对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几乎没有触及。这反映了当时的理论对参加国际分工的基本单位——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行为还缺乏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经过 80 年代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及其所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联系各国经济的传统渠道，如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的重要性正日益相对下降。^①人们已经认识到，现在国际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正像国际贸易 40 年前所起的作用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动机。^②国际分工的深化使企业特有优势(*firm specific advantage*)的基础性作用更加突出。因此，不论就全球范围的分工来看，还是某一地区的分工来看，跨国公司在其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形下，对旨在加强区内各国间的分工与合作的地区一体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跨国

① EUROSTAT, "European Community Direct Investment 1984 ~ 1989".

② TCM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2" UN. New York 1992.

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另一方面,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使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当然也会对公司一体化的过程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对公司一体化问题的研究若不把地区一体化过程及其对市场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包括进去,则有损其理论上的完整性。

本书试图围绕国际生产这一中心,将两种一体化问题结合起来研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这两种一体化现象的出现,是由一个共同的原因造成的,它们都是为了减少市场不完全性所造成的资源配置过程的成本,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市场的不完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交易成本的存在。从罗纳德·科斯(R·H·Coase)开始,西方学者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对企业存在的理由以及企业的性质的解释,已被引入对跨国公司的分析中,并获得很大的发展。共同控制下的内部协调机制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市场机制中存在的交易成本,使企业获得了内部化的优势。^①这一命题可以说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支柱之一。

市场不完全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是结构性扭曲(structural distortion)现象。这种现象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各国市场的分割以及各主权国家政府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是形成这种结构性市场失灵现象的重要原因。它的存在使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要遭遇许多障碍,承担较高的成本。因此各国政

^① R. E. Cav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府通过让渡部分主权,组建地区一体化集团,从经济意义上讲,正是对这种市场不完全所做的反应。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地区一体化和企业一体化视为同一过程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前者是由主权国家政府出面进行的,以宏观决策者的身份来解决问题;后者是由基本经济单位来进行的,是微观决策者对市场不完全所做的反应。然而,尽管二者的目标都是为在一定范围内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但由于宏观和微观决策者的具体目标有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矛盾的,这就决定了地区一体化与公司一体化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抵触的一面。对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地区集团化日趋明显和跨国公司的作用日见重要的今天,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全书从逻辑上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内,以交易成本理论为核心,对两种一体化的必然趋势和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进行了纯理论的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性质的解释及其对企业一体化过程的分析,为我们更清楚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认识国家的职能提供了有用的指南。因为人们为减少交易成本而付出的努力,不仅始于在完全竞争状态下创造了企业,而且可以追溯到更早。我们把通过社会契约而建立主权国家的过程也作为人类为减少交易成本而付出的努力。交易规则的确立是减少社会交易过程中的种种摩擦的第一步。这样,完全竞争状态下产生的企业和自然状态中孕育的主权国家,虽然在范围和职能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都可以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下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现代国际分工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在我们看来,产业内分工的迅速发展、资产专用性的增强和合成资源的出现,

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变化。分工的高度发达需要同样发达的协调机制保证,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机制由于其内在的缺陷和结构性扭曲现象的存在,难以适应现代国际分工的需要,因此市场开辟和市场替代作为地区一体化和公司一体化的相应的作用方式,便是顺应了国际分工发展的客观需求的一种必然趋势。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以西欧的一体化进程为例,对地区一体化和公司一体化相互作用的若干主要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虽然地区一体化和公司一体化都是针对市场不完全而进行的制度创新的产物,但二者的具体作用方式又是有区别的。地区一体化意味着市场的统一和扩大,它倾向于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去实现分工的利益;而公司一体化则是对市场交易制度的一种替代,它把通过市场进行的社会分工转变成依靠管理决策而进行的企业内分工。当这两种一体化同时出现时,就会产生一种市场机制与非市场力量的协调问题,因为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竞争和决策的分散化,而公司一体化则意味着生产的集中和非市场交易的扩大。因此地区一体化和公司一体化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两种一体化的相互作用在整个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表现被我们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地区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现象。虽然这一现象从 60 年代开始就已经发生了,但在进入 80 年代末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不仅继续吸引非成员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更重要的是它也造成了成员国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而且欧洲企业对欧共体以外地区投资的增长速度放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加速了共同体内部企业一体化的进程。其二,地区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

在一体化区域内实现复合一体化战略提供了便利,这一变化对于传统经济学关于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是相互替代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因为共同体内部市场的统一不仅方便了最终产品的贸易,而且也为企间中间产品的交换和专业化分工创造了条件。因此贸易壁垒的减少不仅不会削弱公司一体化的动机,反而增强了公司一体化的可能性。其三,公司一体化运动必然在更大范围内导致生产的集中和垄断,这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有冲突的,这也使地区一体化政策在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面对这种两难困境,欧共体在执行其竞争政策时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双重标准,其依据就是竞争的国际化程度,即竞争的国际化程度越高,所允许的垄断程度也越高。于是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评价一个地区一体化的绩效时,除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比较以外,还应包括在实施鼓励竞争政策时所采取的双重标准和排他性倾向所导致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这对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的大规模整合,以及面对这种形势各国政府在竞争政策和反垄断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的变化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最后一章是对全书的概括和总结。虽然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主要以欧洲为中心,但我们的目的是,将两种一体化的相互作用及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若干规律置于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以检验它的解释力。应该说,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整合运动和主权国家政府间就全球化问题而进行的国际协调,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十分重要的两条线索。在这方面当然还有更多艰苦的工作需要做。自从本书的主体部分完稿之后的近两年来,公司一体化可以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超级企业之间的兼并浪潮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旋

律,由此而引发的问题及其对世界经济走向的影响格外值得关注。

本书的写作是在恩师滕维藻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完成的,如果读者能从这本小册子中得到一点点启发的话,别忘了和我一起感谢我的老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还得到了熊性美教授、薛敬孝教授等前辈们以及佟家栋教授和冼国明教授等老师的关心和帮助。本人的同窗挚友李坤望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也是作者决定出版本书的不可替代的动力。山西经济出版社张凤山社长和李新编辑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